

国家起源新论

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及当代发展

■ 刘 军/著

就马克思国家起源问题，本书主要在“返本”、“开新”和“明史”三个环节进行了自己的尝试。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回应诺思、塞维斯、诺奇克、张光直等当代学术代表人物提出的理论挑战；还根据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以及历史文献的重新解读，力图真实描绘出中国国家起源的历史图景，揭示出中国国家起源的世界历史特点。这对于探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道，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之道，具有启迪意义。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国家起源新论

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及当代发展

刘 军/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起源新论: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及当代发展/刘军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3

ISBN 978-7-80211-618-4

I. 国…

II. 刘…

III. 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研究

IV. D0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0922号

国家起源新论: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及当代发展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高立志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6(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787×960毫米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 言

从古代中国司马迁的《史记》，到近代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乃至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些古今中外的千古名著，都从不同层面涉及国家起源问题，但都留下了今人需要继续研究的学术难题。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气魄，写出第一部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中国通史——《史记》。此书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并选择黄帝为五帝之首、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留下了一部独树一帜的民族史诗，从黄帝时代开始到秦汉之际长达近三千年的中华文明起源定型史。这是那些有民族虚无主义病症的疑古派二千年后仍不能望其项背的真知灼见。当然，作为一名具有学术良心和科学精神的严谨学者，司马迁也多次发出黄帝以前的资料难以把握的感慨：“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①

在司马迁之后近二千年，摩尔根写出《古代社会》一书，其副标题为“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研究”。实际上，这是一部西方古代社会史和文明起源史。它以西半球的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为主要题材，部分涉及古希腊、罗马文明起源史，因而可以说是代表了19世纪西方文明起源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但是，它的历史局限在于没能面向东方和中国，只有一个地方偶然提到“中国人的九族制

^① 《史记》第1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46页。

度”，因此其理论难以具有普适性。

摩尔根之后，马克思做了《古代社会史笔记》（即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但天不假年，马克思在写出关于文明和国家起源的专著前就逝世了。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恩格斯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研究具有三个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理论贡献。

第一，在摩尔根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文明和国家起源这个重大研究课题。摩尔根的研究重心主要在原始社会、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却把研究重心转向从氏族社会到国家社会的演进过程。第二，为探索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即研究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的三把钥匙：物质生产和人自身再生产的统一是理解原始社会的一把钥匙；男性中心个体家庭私有制的产生是理解文明起源经济基础的一把钥匙；国家作为文明社会的概括是从总体上把握文明形成的一把钥匙。第三，根据 19 世纪考古学、人类学资料，重点解剖了四个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历史个案：西半球的印第安文明，西方古典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德意志文明，提出国家形成过程的三种模式，从而提出了多线一体的文明起源观萌芽，既超越了简单划一的单线论，也超越了孤立并存关系的多元论。

但是，由于受到时代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资料比较陈旧，其理论不可能反映出 20 世纪关于文明起源史、国家起源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留下了有待后人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六大原创文明的考古发现尚未作出，他们提出的国家起源模式所凭借的研究材料，多半是不早于公元前 1000 年的古典文明再生形态。如何根据 20 世纪考古大发现时代的最新成果，提出符合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六大原创文明的国家起源模式，是一个崭新课题。其次，20 世纪以来，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及政治哲学等学科研

究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提出了一系列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挑战。这些学科的很多学者纷纷著述探讨国家起源问题，他们对影响国家起源的因素和国家演进的模式问题，都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理论观点。譬如，塞维斯就提出了与马克思氏族理论不同的酋邦（chiefdom）理论。这些理论对马克思国家起源论构成重大挑战，也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国家起源论提供了新的契机。再次，由于当时中国考古发现相对滞后，加上中文古典文献的语言障碍，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基本上落在世界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视线之外。正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所言：“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① 郭沫若之后，夏鼐、苏秉琦、张光直、李学勤、严文明和李伯谦等著名学者，纷纷著述探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新特点。这些研究在考古学和历史学层次都取得了重大进步，如何从哲学角度对之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有待加强。这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探讨中国国家起源的特点及其世界历史地位，写出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中国续篇”。

综观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缺乏从哲学高度对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系统研究。刘军同志《国家起源新论——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及当代发展》一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较为重大的理论创新：一是对马克思晚年笔记做了新解读，批驳了将马克思晚年笔记视为人类学笔记的一般看法，认为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是“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马克思晚年笔记中蕴涵着国家起源理论的基本框架；二是从文本研究出发，对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做了文本学的新发掘、新梳理，总结、概括了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基本要点，并将之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有关观点做了比较，驳斥了当前学术界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没有系统的国家起源理论的错误观点；三是比较研究了马克思国

^① 《郭沫若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家起源理论与现代西方理论学派关于国家起源的不同理论，借鉴当前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哲学以及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有关理论成果，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等方面建构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当代形态；四是运用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分析中国国家起源的道路，并认为中国国家起源模式代表了世界向文明形态转进的主要形态，具有普适价值。总之，这是一部优秀的著作，具有创新性的成果。

刘军同志受到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曾拜读于陶德麟、汪信砚等教授门下。考入北大以后，又受到了更为严格的学术训练。刘军同志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宽阔的学术视野，是我近年来所培养的博士中较为突出的一位学术新秀，也是这代青年学术研究者的突出代表，希望刘军同志在以后的科研中取得更大、更突出的成果。

刘军同志著作交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之际，嘱我作序。欣然提笔，草成数语，是为序！

王 东

2007 年 10 月于蓝旗营寓所

目录

Contents

导论：一个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1
一、研究马克思国家起源论的缘由	1
二、国内外的研究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3
三、论著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11
第一篇 马克思国家起源论的文本新解读	14
第一章 早期著作：马克思国家起源论的最初萌芽	17
一、马克思国家起源思想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	20
二、《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	23
三、《克罗茨纳赫笔记》时期的历史确证	25
四、《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批判	28
五、研究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意义	32
第二章 中期著作：马克思国家起源论的初步探讨	35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国家起源思想	37
二、《纽约每日论坛报》时期的国家起源思想	42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的国家起源思想	48
第三章 晚期著作：马克思国家起源论的潜在整体	58
一、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	59
二、“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中的国家起源思想	65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国家起源论的比较	73

第二篇 20 世纪西方国家起源理论新探讨	78
第四章 农业的起源和所有权的变革	81
一、农业的起源	82
二、排他性所有权的建立	86
三、古典国家的产生和衰落	89
四、批判地回应	92
第五章 酋邦理论和国家起源新模式	97
一、摩尔根部落联盟模式的非普遍性	98
二、塞维斯酋邦模式及评价	100
三、国家起源的新模式	107
第六章 国家起源的断裂—连续性模式和社会动力因素	116
一、国家起源的断裂性和连续性模式	117
二、国家起源动力因素的研究	122
三、批判地回应	126
第七章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国家起源及未来发展	134
一、国家的起源	135
二、国家的职能	139
三、国家的未来发展	143
四、结语	148
第三篇 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中国“续篇”	150
第八章 中国国家起源的历史图景	154
一、中国国家起源时代的历史图景	154
二、中国国家发展时代的历史图景	166
第九章 中国国家起源的历史特点	175
一、中国国家起源的生态前提	176
二、中国国家起源的社会关系基础	180
三、中国国家起源的意识形态因素	186

第十章 中国国家起源的社会科学意义	190
一、国家起源的新形式	191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再思考	195
结语	208
附录 马克思国家观的三大创新	212
一、国家起源和本质论	213
二、国家职能和异化论	217
三、新型国家和民主论	220
主要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43

导论：一个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研究马克思国家起源论的缘由

国家及国家的起源问题，是学术史上古老而常新的话题。迄今为止，人们提出了许多学说来说明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在东西哲学思想史上，大凡杰出的哲学家往往关注两个问题：以本体论等纯哲学问题为代表的形上哲学；以国家及国家起源等问题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当今世界哲学思潮中，以国家问题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愈来愈受关注，大有成为主流哲学的趋势。

马克思十分重视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研究是唯物史观研究中的重要环节。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必须回答“国家”这一最为重要的社会组织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正因如此，马克思在他的论著中，总是利用新掌握的历史材料来反复论述国家起源这个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对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研究很不充分：在目前诸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都没有把马克思国家起源论作为一个明确、独立的问题提出，最多是在涉及国家观这部分略提一笔，这弱化了马克思国家起源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很多研究马克思国家起源问题的文本依据局限于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不全面的；有的研究甚至断章取义，歪曲马克思主义在国家起源问题上的本来面目。

与此同时，20 世纪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及政治哲学等学科研究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提出了一系列新材料、新史实、新理论和新挑战，这些都迫切呼唤哲学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国家起源论：

1. 20 世纪 60 年代，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英国学者丹尼尔（Glyn Daniel）在《最初的文明》（*the First Civilizations*）一书中，提出必须区分原创文明和再生文明，并指出世界上存在六大原创文明。而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古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国家起源，已是第三茬再生国家。这里潜在的问题就是：由于受当时的考古和历史资料所限，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对象不是原创国家，那么他们提炼的有关国家起源的理论是否对原创国家适用？

2.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中心转向国家起源问题，塞维斯（Service）、弗里德（Fried）、卡内罗（Carneiro）、克拉森（Claessen）、特里克（Trigger）等人纷纷探讨国家起源问题。他们对影响国家起源的因素和国家演进的模式问题，都做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回答，这些对马克思国家起源论构成重大挑战。譬如，塞维斯的首邦（chiefdom）理论与氏族理论何者更有解释力？抑或还有第三种国家起源模式？

3.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诺思（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将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建立了全新的国家起源模型。这种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带有历史唯物主义色彩。但是，新制度主义也对马克思进行了错误的批判，这需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做出积极回应。

4. 20 世纪一百年间，中国出现了考古发现，尤其是史前考古（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的黄金时代，并带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大发展。郭沫若、夏鼐、苏秉琦、张光直、李学勤、严文明和李伯谦等著名学者，纷纷著述探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新特点。这些研究在考古学和历史学层次都取得了重大进步，如何从哲学角度对之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有待加强。这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探讨中国国家起源的特点及其世界历史地位，写出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中国“续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始终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如何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出发，总结、概括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有关论述，并积极回应 20 世纪国内外学术界提出的各种理论

挑战，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当代形态，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应尽责任。

二、国内外的研究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国家起源问题研究由来已久。广义上说，西方对国家起源理论的研究可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相应地，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和法家等学派的学说也包含着某种国家起源理论。“在中国的丰富材料中，儒家学派和法家学派的思想表现出了类似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相互对立的观点”，前者是融合论（the Conflict Position）的，后者是冲突论（the Integration Position）的。^①

17、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国家起源问题也有诸多论述，也表现为融合和冲突两派。融合论的理论背景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契约论，有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等人。冲突论的理论鼻祖是卢梭，他认为，财富悬殊带来社会混乱，于是建立新的制度，“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人以新的力量”。^②

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近现代学者展开了他们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

19 世纪是国际学术界研究国家起源问题初具规模的时代。这一时期，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开始从哲学思辨转向以实证材料为基础，并出现了两位有着杰出贡献的先锋式人物：梅恩（H. S. Maine）和摩尔根（L. H. Morgan）。前者的代表作是《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 年），后者的代表作就是著名的《古代社会》（1877 年）。稍后的马克思晚年笔记，对梅恩和摩尔根等人的著作做了摘录和点评式的研究，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吸收了摩尔根等人的理论成果，对马克思的研究做了新的概括，对国家起源问题做了积极探索。马克思和恩格斯

① 乔纳森·哈斯：《史前国家的演进》，求实出版社，1988 年，第 7 页。

② Jean - Jacque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translated by Maurice Cranston,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 Penguin Books, 1968, P227.

的研究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20 世纪上半叶，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蔡尔德（V. Childe）对国家的起源做了深入研究，他的《文明的诞生》和《城市革命》从总体上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至今仍颇有影响。这一时期的学者已开始研究国家起源的演进过程和影响国家起源的动力因素。前一方面的研究以斯图尔德（Steward）为代表，他的《关于文化进化的理论》（1955 年）一书，提出了人类从狩猎和采集水平发展到国家水平的进化序列。

当前国际学术界最新水平的国家起源问题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这一时期是国家起源研究的成熟阶段，其理论成果大体上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影响国家起源的动力因素研究进一步深入。在魏特夫“灌溉说”的基础上，又有卡内罗的“战争说”、哈纳和杜蒙德的“人口压力说”、拉思杰和赖特的“贸易说”，以及亚当斯的“综合变量互动说”。卡内罗的战争说认为受到地理和社会限制的农业聚落之间会因为人口的增长和耕地的短缺发生冲突，进而发展到频繁的兼并战争。战争直到一个区域被最强大的酋邦统一为止。^① 人口压力说认为，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长造成基本生产资源短缺的压力，这种压力一般通过首领的再分配来加以化解。再分配体制的形成，会促使生产资源私人化和世袭体制的发展，并形成集中的政治结构。贸易说则认为，具有国家水平的权力是通过管理大范围的贸易系统而得到完成和加强的。由于强调单一变量的理论存在许多缺陷，美国考古学家亚当斯在总结了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多变量反馈和互动的综合理论。亚当斯至少讨论了十二种相互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即国家的形成。亚当斯还对文明和国家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文明是一种广泛和世代延

① Carneiro,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 169: 733 - 738, 1970.

续的文化现象，而国家是根据政治和地域界限划分的等级社会^①。

第二，对国家起源的演进过程和发展阶段，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模型。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E. Service）提出了群队（bands）、部落（tribes）、酋邦（chiefdoms）和国家（states）的四阶段社会进化理论，把酋邦看作是从原始平等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并将其定义为“具有一种永久性集中协调机构的再分配社会”^②。美国政治人类学家弗里德（M. Fried）也提出了四个阶段的演化模式：原始平等社会（egalitarian - society）、等级社会（ranked - society）、分层社会（stratified - society）和阶级社会。弗里德和塞维斯虽出自同一师门，但他们的四个阶段并不重合，塞维斯的酋邦跨越了等级和阶层两类社会。弗里德给国家的定义是：超越血缘关系的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③。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部体现国家起源问题研究总体水平的集成之作，即在海牙出版的由克拉森（H. Claessen）、斯卡尔尼克（P. Skalnik）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和《国家研究》二书。尤其是《早期国家》^④一书，几乎囊括了当前国际学术界研究国家起源问题的所有重要学者，如欧美的柯恩，前苏联的哈赞诺夫、柯恰柯娃，前捷克的波柯拉、坎德尔特，以及印度的塞耐维拉特尼等人。此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是8篇理论性文章，第二部分则收入了关于世界上不同历史时期的21个早期国家个案的专论。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两大发展趋势。

第一种发展趋势是绕开酋邦的有关争论，讨论从前国家社会演变到国家社会的过程中某些机制的作用：一是将再分配机制的发展认为是社

① Adams,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②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③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④ H. Claessen & P. Skalnik, ed., *The Early State*, Mouton Publisher, Hague, 1978.

会进化的主要动力；二是从信息加工方式的不同看两种社会类型的不同和演变。

对于再分配机制的作用，美国学者阿诺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和自然资源平衡被打破，原始社会中平等互惠的机制难以为继，遂向再分配的形式转变。再分配机制可以在供求失衡的情况下，合理分配资源以避免冲突。但是，再分配活动会促使一些首领人物运用权力操纵劳力和占有资源，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出现。阿诺德认为，原始社会的成员并不愿意接受强制性的控制。但当外界压力严峻，如食物短缺、环境恶化时，人们会被迫放弃等级平等、生活自由的状态以换取社会生存保障。再分配机制复杂化的政治表现就是首领权力的增强、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强化^①。在国家社会初期，社会管理机制尚不完善，宗教是一种有效手段。为了体现首领作为神的代表的特殊身份和超自然的伟力，国家社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营造大型的祭祀建筑和陵墓，举行大规模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规范不同群体成员的行为方式，从而保证在出现社会等级区分和阶层分化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仍然表现出由共同信仰维系成一体稳固性。

对于过渡态社会（酋邦）和国家社会的不同，一些研究者从信息加工方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的角度进行了探讨。酋邦的内部没有分工，首领大权独揽，事必躬亲。他必须同时加工处理所有的信息，并将决定直接传达给酋邦中的每一人。但他能处理的信息总是有限的，一旦酋邦规模扩大，他的信息加工很快就会达到极限，决策的质量也很快下降。而国家首脑的信息加工方式是有复杂分工的。国家机器运转时，能将各种活动分成不同的类型，并且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完成。国家首脑可以将权力下放而不担心权力失控，因为下级统治者只能接触到有限的信息。上级统治者还可通过自己的渠道或与其他统治者的信息传输，来识别和修正下级上报的虚假信息。这种专业化、等级式的信息加工方式，使信息加工、传输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这是酋长处理信息

^① Anorld, *Labor and the Rise of Complex Hunter - gatherer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2: 75 - 119, 1993.

的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三到四级管理阶层的诞生。可见，酋邦有不可突破的信息加工和传输的制约瓶颈，其扩张和发展因而受到限制，必须代之以专业化、等级化的官僚体制，酋邦于是进化为国家。^① 吉登斯把对信息的收集、储存和加工视为同物质生产一样的影响国家起源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对于那些时空范域比部落文化远为广大的社会体系来说，信息的储存在‘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的建构过程中，至关重要。而监控（surveillance），即对信息的控制以及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的活动所进行的监督，反过来又成为权威性资源得以扩充的关键性因素。”^②

第二种发展趋势是探讨部分早期国家延续和灭亡的原因及现代借鉴意义。

已有的研究表明，大部分的早期国家都是短命的。这促使一些学者努力探讨国家崩溃的原因，挖掘其现代借鉴意义。泰恩特（J. A. Tainter）认为，管理和维持社会运行的成本和社会剩余产量之间的消长关系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当社会的大部分人力、物力资源被用于奢侈消费、宗教祭祀和建造陵墓，而非供养民生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必然被这种难以逆转的能量透支拉垮^③。美国学者科（M. D. Coe）侧重从宗教角度探讨了上层建筑对社会运行的双重作用。他认为，宗教既是维持现状，也是毁灭现状的一种力量^④。当一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依附于宗教机制，并被神权加以强化和神圣化后，任何变动都将被视为离经叛道。这样，过度僵化的宗教体制会削弱社会的应变机制，并成为导致社会崩溃的导火线。^⑤

① 参见李润权、陈星灿：《有关国家起源的两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02年10月25日。

②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第2页。

③ Tainter,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④ M. D. Coe,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esoamerican State, In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⑤ 参见陈淳：《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